



引用格式:马俊峰,马继.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思想探究——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1-6.

中图分类号:A1;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01-06

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思想探究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ploration of Engels' s historical spacing thought

—Rereading Ludwigs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马俊峰, 马继

MA Jun-feng, MA Ji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间距性分析表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紧张,其实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知性冲突的一种表现。一旦把这个问题置于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架构中,间距性分析将为解决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恩格斯;
历史间距性;
政治哲学

收稿日期:2017-07-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5)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省张家川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

“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阅读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间距。哲学解释学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诉诸阐释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既承认存在着历史性间距,又主张在理解中消融这种间距,这使得同一与差异在阅读中得以同时呈现。其实,文本阅读就是主体在努力实现理解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使得内在蕴含的差异性得到进一步的延迟。因此,反复性阅读和理解就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在场、空缺、隐匿之实在结构得以显示,从而真正达到对文本的新的有效性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拟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进行重新解读,旨在透过言语深入到其内部结构,探讨隐含其中的历史间距性思想。

一、互为表里的哲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在《终结》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间隔。他认为,这种间隔容易使人们对过去产生隔膜,这不仅表现在经验层面,而且还表现在人的意识记忆方面。历史性使得人们的意识产生一种连续性的观念,使得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通过历史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当过去发生的事件在记忆之中所遗留的踪迹对记忆本身是一种刺痛或者伤害的时候,记忆就会不愿面对,从而有意或者无意地逃避事实,使得间隔在时间上延续,以此让自己在忘却记忆之中传承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的话语:“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1]214}

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历史性间距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客观、正确。如果

深入到历史事件中,受其情势的影响,人们将会变得不理性,被历史人物的激情和主观性偏好左右,换言之,人们容易用感情取代理性。这样,将会无法真正洞察历史的真相,而历史也将封闭或者隐藏自身。一旦人们理性地对事件进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就会立刻变得清醒与明智,就会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而这种严密的逻辑分析对于历史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这种历史间距分析方法,恩格斯对18世纪的法国与19世纪的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比较,试图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联。恩格斯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1]214}这就是说,哲学在法国人那里,比在德国人那里表现得更为激进。哲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对基于意见建立起来的政治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就使得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二者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激化,政治权力就会围剿从事哲学的人。政治权力在无法支配哲学强力意志的时候,就会启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哲学,以保证政治权力畅通无阻地运行。此时,哲学就成为政治的死敌。可以说,政治权力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恩格斯在对哲学在德国处境的分析时提及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德国成了官方哲学,它协调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

盾。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哲学是如何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意味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对“真正真理”的追求,而是一种国家哲学。这样,哲学就丧失了本真,成为政治的奴仆,它不再对政治进行批判,成了普鲁士封建王权统治的捍卫者。这样,政治与哲学握手言和,共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支配和操纵着人们。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历史间距性比较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哲学与政治内在关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激进的关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积极介入,通过批判方式指认政治权力运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其偏差,力图建立正确的政治权力逻辑运作机制。如果政治当权者不愿接受哲学提供的观点,二者将会进入“斗争”状态,这种“斗争”就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激烈较量。另一种是保守的关系。哲学沦落成为对现实政治的辩护,放弃自己的求真意志而转向对权力的追求,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实现自身。这种不顾原则性的妥协埋葬了自己,从而也将终结了哲学自身,这种哲学妄图“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19}。总之,如果哲学与政治处于激进关系中,哲学的处境将是不妙的;而哲学的妥协,又会让其堕落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恩格斯告诉我们,黑格尔构建自己哲学体系时,似乎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做法也使得黑格尔哲学遭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评价。恩格斯以黑格尔的一个哲学命题为例对此作了分析。这个命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215}。这个命题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人们往往把他们对该命题的理

解等同于黑格尔本人所表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把一切现存的东西神圣化,不仅威廉三世是这样看的,其臣民也是这个看法。恩格斯认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认识。恩格斯区分了“现存”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认为这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实”不等于“现存”,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揭示了一般大众理解哲学观念时容易把“现象”等同于“本质”、把“偶然”视为“必然”的通常倾向,而哲学尊崇理性逻辑,提出的命题是一种普遍必然性的表述,蕴含着辩证否定。所以,恩格斯说:“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成了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216}恩格斯因此颠覆了一般人把现存神圣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由时间间距转向空间间距。这种转向具有极大的变革意蕴:旧的间距建构的观念被消解,新的间距建构新的秩序和观念。

二、辩证法的政治向度

基于这种间距转向,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并非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政治的辩护,而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性,究其原因“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

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1]216-217}恩格斯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合理性成分,这就是它的革命性的辩证法。也就是说,革命性是基于现实必然性,一旦维持现实必然性的条件不复存在了,现实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性,就会被另一种必然性取代。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一切事物及其观念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运用这种辩证法去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黑格尔哲学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反而蕴含着对普鲁士王国很大的颠覆性。可是,这种革命性并不是黑格尔本人的主张。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辩证法为它自己建构的体系所窒息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1]218}。恩格斯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拯救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凸显其革命性就成了恩格斯所要做的工作。

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置于政治和宗教实践活动中,指认选择黑格尔辩证方法的人,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最极端的反对派;选择黑格尔唯心体系的人,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保守派。这样,黑格尔学派就分裂成了左翼和右翼。这两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走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样一来,“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1]222}。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随着其体系的解构而随之消除。因为这样的矛盾其实负载于体系,而这个体系是客观观念,它的负载物会随着实体观念的破除而消失。恩格斯因此告诉人

们,一旦基于哲学视角去理解政治和宗教的时候,就会遇到诸多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体现在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方面。而观念与观念之间因张力敞明空间,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镶嵌之中,在滑动与停留过程中弥合和修补裂隙,间距产生的空隙在晦暗不明中“绽放”。

因此,一旦我们从实践出发洞识哲学、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辨识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这种有效方式不是把黑格尔的全部遗产“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而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2]40},而是采用新的方法即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2]112}在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规律;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客观辩证法。鉴于此,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对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做了深入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始终坚持客观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思维都服从这个规律。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建立一门历史科学的主张。这也充分说明认为自然与历史之间存在对立只是一种旧的历史观,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就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来超越这种旧的历史观。实际上,恩格斯在《终结》中强化了这种思想,即在一般运动规律的

辩证法意义上强调自然与历史的一致性。可以说,如果说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那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辩护和宣传的时候,不正是从历史科学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来阐明它的方法论及其科学性质吗?^{[3]50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自觉的写作不再是一种纯知识的需要,而是始终服务于现实分析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就辩证法的问题来说,只是在任务变得迫切、马克思本人没有精力完成它的情况下,恩格斯才毅然地承担了它。《反杜林论》的创作直接证明了这一点。”^{[3]302}而这种“服务于现实”的实质就是旨在把辩证法锻造成为“批判的武器”,即要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揭示了资本危机和这种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规律,从而从根本上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现实道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在《终结》中同样也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258}。也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才能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他们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实现者。

三、词与物间距指称非法使用的伦理后果

恩格斯在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针对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对哲学做了划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恩格斯写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这就告诉我们,这两种关于世界本原性问题的回答仅仅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分。问题只在于认识主体选择不同的认识方式,其实践作用各不相同,仅此而已。

从恩格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用语来看,他更具有一种后来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味道,即拒斥形而上学的语义学观点。语词在意义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词与物并非一一对应,相反,语词的意义是基于语句表达和语境而产生的。恩格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一旦成为党派斗争的原则,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理论武器,就不再仅仅被视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是被建构成为不同阶级的政治立场。这样,一种信念就被确立起来: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的继承者,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深切感到费尔巴哈哲学虽杂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理解上融入了道德价值取向。这种做法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让唯物主义蒙羞。恩格斯指出,一旦“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1]242}。恩格斯这是在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只是在知识论语境中才有意义,它表明了人们头脑中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更进一步表达了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一旦我们用已获得的知识去透视世界的时候,我们最为关注的显然是这种知识是怎样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仅仅限于知识论领域,否则,对它们的使用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

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模糊了”^{[1]253}。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观念都能够提升为一种知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间距,可能会使得一些知识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1]254}。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对自己拥有的观念产生的根源有正确的认识,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而人们使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去认识与改造世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恩格斯再次指认无产阶级为主体,“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258}。德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就在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德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9}。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选择德国古典哲学,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而完成这个使命的实质是把哲学变成现实。恩格斯试图表明,知识的生产者使得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对自身职位和收入的担忧,会把知识转化为意识形态,与官方保持一致,以乞求自身利益得到保护。而工人阶级在面对生产出来的知识的时候,兴趣指向科学本身。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能够使他们超越外在于他们的名和利的约束(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使得求真意志与求善意志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会运用基于这种统一确立起来的权力意志,争得话语权和领导权,从而达到解放自身,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关系的间距性分析,使我们看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其实质是一种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在知性上的冲突,一旦把哲学与政治置于实践层面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4]73}。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构成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关系问题的一种思路,它为解决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既表明关系内在冲突和矛盾的正当与合理,又表明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既为我们解构关系所固化的结构又为我们建构新型关系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间距性分析方法,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